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初步构想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中心（下编）

Initial Ideas for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Gugongology(Gugong Studies)’: Centering on Beijing Palace Museum

王　素

Wang Su

内容提要：

“故宫学”博大精深。关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也有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本文认为：“故宫学”的学科建设，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具有前瞻性，或者说必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另外，谈到“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也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不能将其研究对象的时代局限为明清。理由很简单，就是历史本身是不能割裂的。既是“数典不能忘祖”，也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东汉王充《论衡·谢短篇》先批评：“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后批评：“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此二者都是“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大忌。据此可知，“故宫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应该立足明清，更应该追溯历代。本文根据学科建设越来越细化的时代要求，先在“故宫学”之下分设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十个子学科，并举例稍加解说。但仅此也只是给“故宫学”支起一个简单粗略的框架。“故宫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大的细化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关键词：

故宫学　学科建设　十个子学科　初步构想

ABSTRACT :

GIt is viewed that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Gugongology’ (Gugong studies) which consists of an extensiv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involves a long-term explor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the project would be foresighted and sustainable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due to the fact that history is no isolated or separated just as the proverbs say “One mustn’t forget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ast can guide on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ate back from previous histories beyo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nswer to the more specific classifications of any subjects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initial idea in this article that ‘Gugongology’ (Gugong studies) should be composed of ten sub-subjects——history, archaeology, cultural relics studies, philology, religion studies, publishing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with brief explanation to each. Needless to say, it is just a rough framework for such a giant project, so more efforts will be necessarily made to improve it.

KEY WORDS :

Gugongology (Gugong studies); subject construction; ten sub-subjects; initial ideas

六 出版学

出版学与文献学关系密切。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学，虽然迟至19世纪后期才出现，但出版学的三个基本子学科：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其雏形却是自古就存在的，而且首先是在宫廷存在的。譬如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如果没有编辑、印刷、发行，是很难让臣民贯彻执行的。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编辑有时称纂修或辑定，印刷有时称抄写或雕刻，发行有时称颁布或出鬻。作为“故宫学”的出版学，至少可分历代宫廷出版业、明清宫廷出版业二大研究领域。此外，支撑故宫图书出版的相关出版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历代宫廷出版业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其中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最大，而这两大发明都应出自宫廷。蔡伦造纸是众所周知的[1]。蔡伦是东汉和、安二帝时的宫廷宦官，他造纸自然也是出于宫廷出版的需要。印刷术中雕版印刷的起源，古今聚讼，迄无定论。向达先生认为“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2]。我则认为，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中央颁历更有关系。《新唐书•百官志二》司天台条记职掌之一为“岁颁历于天下”[3]。而中央颁历自应不始于唐代。《后汉书•百官志二》太常属官太史令条：“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向皇帝奏上新年历，自然是让皇帝颁历。皇帝每岁都要颁历天下，数量自应非常可观，仅靠抄写工作量太大，于是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因此，将雕版印刷的发明权归于宫廷出版机构，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此外，中国印刷术之起源，还与历代皇帝个人喜欢著述和喜欢组织纂修图书有关系。

1. 汉唐宫廷的写书与写经

汉唐时期的整个出版业，都还处在印刷史上的抄写时代，宫廷当然也不例外。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宫廷的出版业主要是写书；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宫廷的出版业大量是写经。不管是写书还是写经，只要是宫廷出版的，都是精品。

（1）汉魏宫廷写书

这里特别提出汉魏宫廷写书，并不是说此前宫廷就没有写书，而是说汉魏宫廷写书较具代表性，因为有两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这就是汉武帝和魏文帝。

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挟书律”，敢于私藏图书者灭族，很多珍贵典籍因此亡佚。《汉书•艺文志》

1 按：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西汉麻纸频繁出土，如1933年的罗布淖尔纸，1957年的西安灞桥纸，1973～1974年的居延肩水金关纸，1978年的扶风中颜村纸，1979年的敦煌马圈湾纸，等等，引起学术界对造纸的起源争论不已。否定蔡伦者，认为造纸技术早已有之，史籍归功蔡伦，实属错误。维护蔡伦者，认为这些所谓西汉纸，实际都不是真正的纸，蔡伦的功绩不容抹杀。我则一直认为：即使这些所谓西汉纸，都是真正的纸，也决不影响蔡伦作为造纸发明者的地位！盖一项重大发明，需要长期积累，本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真正的发明者，也是需要具备相当素质的。就此而言，也只有蔡伦，才有条件作为一个真正的发明者。见王素：《风雨蔡侯祠》，《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第4版（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等编《纸史研究》第15期全文转载）。

2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26页。

3 据《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州不得私置历日版。”《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知颁历为中央特权，私印历书属于违法。

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祕府。”其中“置写书之官”，是首次见于史籍，最为重要。当时“书缺简脱”，只能根据臣民献的书抄写补全，这就需要设置专门的写书之官。此外，《汉书·艺文志》著录“上（指武帝）所自造赋二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汉武帝的赋及文集，也应是由写书之官抄写藏于祕府并得以流传的。

魏文帝即曹丕。曹丕不仅个人喜欢著述，还喜欢组织纂修图书。《隋书·经籍志》（四卷）著录曹丕个人的著述就有:《典论》5 卷、《士操》1 卷、《列异传》3 卷、《魏文帝集》10 卷[1]。还著录了曹丕组织纂修、署名缪袭等撰的《皇览》120 卷[2]。《典论》今仅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其中《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首次提出“文以气为主”，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皇览》虽然完全失传，但它是中国第一部奉诏纂修的大型类书，所谓“类事之书，始于《皇览》”[3]，在中国类书纂修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书籍，也都是由写书之官抄写藏于祕府并得以流传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吴历》还说：“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曹丕将自己的著述分别赠送孙权、张昭君臣，当然不会是自己抄写，也都是由写书之官完成的。

（2）隋唐宫廷写经

汉魏以降，南北朝时期，宫廷写书、写经并重，写书有专职的书吏，写经有专职的写经生。梁朝皇帝都是大学问家。据《隋书·经籍志》（四卷）初步统计：梁武帝萧衍个人著述 31 部、近 1500 卷，梁简文帝萧纲个人著述 8 部、233 卷，梁元帝萧绎个人著述 14 部、236 卷。梁武帝还组织纂修大型类书《华林遍略》620 卷。吐鲁番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高昌王麴乾固等供养的宫廷写经不少。麴乾固供养的《仁王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说“敬写《仁王经》一百五十部”，不仅生产任务很重，发行任务也很不轻。到了隋唐，宫廷写经更为兴盛，雕版印刷的发明也就呼之欲出了。

隋朝皇帝中，惟炀帝杨广才艺俱佳，不仅自己喜欢著述，还喜欢组织纂修图书。《隋书·文学·虞绰传》说:“大业初（605 年），转为祕书学士，奉诏与祕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但同书《经籍志》（四卷）仅存《隋炀帝集》30 卷、《长洲玉镜》238 卷、《北堂书钞》173 卷等。文帝杨坚虽然“素无学术”，但却与皇后、公主都是佛教信徒。《隋书·经籍志四》说：“开皇元年（581 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祕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是一次波及全国的写经活动。“一切经”就是后来的“大藏经”，要求一律“官写”，工作量极大，想必宫廷也不能置身事外。敦煌藏经洞还出有开皇九年（589 年）皇后敬造的《大楼炭经》、《甚深大回向经》，此皇后即文帝的文献皇后独孤氏。还出有清河长公主为“文皇帝、献皇后”敬造的《佛本行集经》、《阿毘昙甘露味论》。这些也都

1 但《隋志》著录曹丕个人的著述应属残存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说：“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知曹丕个人的著述原有近百篇之多。

2 《隋志》著录《皇览》仅 120 卷，亦应属残存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说：“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同书《杨俊传》注引《魏略》记王象“受诏撰《皇览》，……数岁成，藏于祕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

3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 年，1025 页。

属于宫廷写经。

到了唐代，宫廷写经规模较隋更大。敦煌吐鲁番出土大量唐代宫廷写经。这些宫廷写经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写经。主要有颜师古考定的《五经白文》，孔颖达等撰定的《五经正义》，唐玄宗注、元行冲疏的《御注孝经疏》等。《旧唐书·儒学传上》序说："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於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新唐书·儒学·元行冲传》说："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1] 一种是佛教写经。尤以唐高宗咸亨（670 年）至仪凤（679 年）年间为多。程序规范完备。书手来自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以楷书手为多。写完之后，还要经过初校、再校、三校、详阅等工序，并经专职的装潢经手装潢，然后作为标准性经文发给各州的寺院。所有纸张、笔、墨及装潢用料均由皇家供给[2]。这些宫廷写经纸质细腻，书法精美，在中国版本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宋元宫廷的监署刻书

宋元时期的整个出版业，都已处在印刷史上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时代，宫廷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时的宫廷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刻书机构，宫廷需刻之书，都是交给中央相关刻书机构办理。具体而言，宋宫廷刻书交给国子监办理，元宫廷刻书交给兴文署办理。国子监和兴文署分别是宋元宫廷的代理刻书机构。

（1）宋宫廷的国子监刻书

从北宋开始，中国图书版本形成三大系统：一是官刻本，二是坊刻本，三是私刻本。其中官刻本又分为二大系统：一是中央官刻本，二是地方官刻本。当时中央很多机构都刻书，如国子监、刑部、崇文院、秘书监、太史局、礼制局等，其中以国子监刻书最多也最著名，国子监刻的书称为监本。国子监刻书可以追溯到五代[3]。其具体刻书部门，原名印书钱物所，后因名称不雅，淳化五年（994 年）改名书库官。《宋史·职官志五》国子监书库官条说："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可见出版（刻书）、发行（出鬻）已经形成一条龙。此外，"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值得注意。同书《儒林·邢昺传》说："（景德二年，1005 年）夏，上（真宗）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从皇帝本人亲自过问国子监出版业来看，所谓"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具体也是指皇帝本人的需用。宋代没有具体的宫廷刻书机构，国子监就是宫廷的代理刻书机构。

从北宋开始，中国图书刻印也形成三大中心：一是浙江，二是四川，三是福建。浙江称浙本，四川称蜀本，福建称闽本或建本。其中浙江以杭州为中心。连北宋国子监也多是远离都城汴梁长途跋涉到浙江杭州刻书。譬如北宋太宗、真宗两朝诏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真宗诏邢昺等校定的《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等"义疏"，真宗、仁宗两朝诏选官及王洙、陈绎、余靖等校勘的五代以前各朝正史，大致都是国子监在杭州刊刻的[4]。因而南宋渡江，定都杭州，

1 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131 ～ 140 页，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5 年第 3 期，44 ～ 53 页。

2 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塚本博士颂寿记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 年，647 ～ 667 页；赵和平：《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净心慈恩，盛世长安：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大慈恩寺，2009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3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王国维遗书》第 11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

4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遗书》第 12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

中国图书刻印三大中心依然如旧。南宋时期，不仅国子监在杭州刻书甚夥，其他中央、地方有关机构也在杭州刻书不少。揆其原因，首先固然是“御用”图书较多，官府资金雄厚，还有一点就是，朝廷出于种种考虑，对坊刻图书管制甚严[1]，力图用官刻图书取代坊刻图书。不管怎样，宋代刻书以浙本为最好，浙本以监本为最好[2]，而监本以“御用”图书为最好，这与宫廷刻书对质量要求较高很有关系。

（2）元宫廷的兴文署刻书

元代图书版本系统与宋代相同。当时中央很多机构也都刻书，如兴文署、国子监、广成局、太医院、太史院等，其中以兴文署刻书最多也最著名，兴文署刻的书称为署本。《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条说：“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同年兴文署本《资治通鉴》王磐序即说：“（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剞刻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见行动之迅速。此后，世祖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八年（1291年）分别颁行的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中书省所辑《至元新格》，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刊行的《列女传》、《图像孝经》、《大学衍义》，仁宗于延祐元年（1314年）命集贤院译写的《资治通鉴》，也应该都是由兴文署组织刻印的[3]。元代没有具体的宫廷刻书机构，兴文署就是宫廷的代理刻书机构。

元代不仅兴文署刻书较多，其他中央有关机构也刻书不少。原因应与前述宋代大致相同，也与朝廷对坊刻乃至私刻图书管制过严有关。如清蔡澄《鸡窗丛话》说：“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按：元代无“学使”之官，这是蔡澄以清制推拟。“学使”应指儒学提举司官员。《元史·百官志七》儒学提举司条：“儒学提举司，秩从五品。各处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其职责之一就是“考校呈进著述文字”，与蔡澄所说大致相符。总之，元代刻书以署本为较好，这也与宫廷刻书对质量要求较高有一定关系。

（二）明清宫廷出版业

明清宫廷出版业的最大变化，是宫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刻书机构。明宫廷的刻书机构主要是内府司礼监所属经厂，清宫廷的刻书机构主要是内务府所属武英殿修书处。这两个宫廷刻书机构为当时的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1. 明宫廷内府司礼监经厂刻书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却对文化非常重视。《明会要·学校下》书籍类洪武元年八月条记：“诏除书籍税。”这虽是准备振兴出版业的壮举，但当时战乱初定，百废待兴，书籍出版实际尚难提上议事日程。

---

1 参阅：谢水顺、李珽：《宋代官府对建阳坊刻的管制》，《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林剑华：《宋代官府对坊肆刻书的管制》，《闽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38～42页。

2 但必须指出：“三朝本”除外。因为南宋、元、明三朝递修的“三朝本”，其主要问题是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书版成分复杂且残缺，但这与战乱有关，并非全属国子监的责任。

3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262～264页。

况且如明陆容《菽园杂记》所说："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而国子监书版又损坏严重。如《明会要·学校下》书籍类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条又记："帝以国子监所藏书板岁久残阙，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因而洪武前期，屡次诏颁《四书》、《五经》、《新序》、《说苑》等书于学校，多是购求所得。开刻《洪武南藏》也是由南京蒋山寺代理。加以朱元璋对宦官提防甚严，尚无所谓内府本图书面世[1]。

明成祖迁都北京，组织纂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以及开刻《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感到没有宫廷刻书机构不太方便。加以成祖对宦官本就颇为倚重。于是，开始在内府司礼监下设置经厂。明吕毖《明宫史》卷二说："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道藏，番藏，皆佐理之。"经厂下设汉经、番经、道经三厂。一般认为：汉经厂专刻四部书，番经厂当刻佛经，道经厂当刻道藏[2]。但据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 年）所撰《番经厂记》:"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番经厂实际专刻藏文佛经[3]。则知汉经厂不仅刻四部书，也刻汉文佛经。经厂刻印的书称经厂本。经厂本书多是黑口、白纸、赵体字，版宽行疏，庄重华美，多属善本。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八有《内板经书记略》，述其刻书始末。《四库全书》收《经厂书目》一卷，《提要》说："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4]。经厂即内翻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板皆贮于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幅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属于偏见，不足为信。

2. 清宫廷内务府武英殿修书处刻书

满清初入关，就非常重视纂修并刻印图书。据陶湘《清代殿本书始末记》记载，最早由宫廷纂修并刻印的图书是《大清律》，该书于顺治三年（1646 年）修成，当即在明经厂旧址利用原有工匠刻板，故格式与经厂本大同小异，次年颁行全国。此后，随着汉化速度加快，组织纂修图书成为时尚。康熙诏编的最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诏编的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属于其中代表。清代宫廷开办过的纂修图书机构，除了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外，还有国史馆、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经史馆、御书处等数十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内务府武英殿修书处，不仅修书，而且刻书。

武英殿修书处的前身是文书馆。《清史稿·职官志五》内务府条谈"初制"时曾提到:"文书馆，置承制，左、右佥承各一人。"然后说：康熙二十九年"改文书馆为武英殿修书处，置监造官六人。"其中"正监造员外郎、副监造副内管领，六品库掌、委署主事各一人，七品衔库掌二人。"又内务府附武英殿修书处条说："武英殿总裁，满、汉各一人;提调二人，纂修十有二人，协修十人，笔帖式四人。"（人员后来均有变化）并明确说:"武英殿修书处掌监刊书籍。"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称殿本。乾隆年间武英殿修书处曾用 25 万个木质单字选印《四库全书》中的善本，因而又称武英殿聚珍本。《清史稿·艺文志二》史部政书类还收有乾隆三十八年金简

1 周心慧认为："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皆是，称'内府本'。"见：《明代版刻述略》，《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 年，240 ～ 241 页。与本文见解不同。

2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插图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63 页。

3 陈楠：《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中国藏学》2006 年第 2 期，138 ～ 143 页。

4 按：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〇收《内府经厂书目》实为二卷，并非一卷。

等奉敕撰的《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卷。

武英殿修书处自成立伊始，就是宫廷最重要的刻书机构，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图书出版体系。据统计，清内务府刊刻图书共 700 余种，大多出自武英殿修书处。参与武英殿修书处整理、校刊、辑佚、汇编、出版、发行者最多时达到上千人，甚至一些朝廷大臣也被发配其中戴罪工作。如乾隆时的刑部尚书、抚定苗疆大臣张照。《清史稿·张照传》说：“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内容也非常广泛，卷帙最多、流通最广的有“九通”、“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为历代宫廷刻书机构所不及。这些已为人所熟知，这里就不多说了[1]。

（三）相关出版单位

北京故宫虽然没有支撑出版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但有自己的紫禁城出版社，以及一直保持业务关系的其他出版单位。这些出版单位为宣传故宫和推动“故宫学”的发展都曾做出重要贡献。

1. 紫禁城出版社

紫禁城出版社成立于 1983 年，是著名出版家刘北汜先生经手创办的。在此之前，刘北汜先生已先后经手过《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紫禁城》杂志创刊等重要工作。紫禁城出版社成立二十多年来，出版过大量宣传故宫、弘扬“故宫学”的论著，似乎可以视为明清宫廷出版机构的另一种延续。

2. 其他出版单位

其他出版北京故宫图书的单位主要有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商务印书馆。

（1）北京文物出版社

北京文物出版社是国内资深文物类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成立之前，北京故宫的图书主要都由该社出版，如《故宫建筑》（1959 年）、《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1962 年）、《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二集）》（1963 年、1977 年）、《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1965 年）、《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1974 年）等；紫禁城出版社成立之后，北京故宫的图书仍有部分由该社出版，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1992 年）、《明清青花瓷器：故宫博物院藏瓷赏析》（2000 年）等。

（2）香港商务印书馆

香港商务印书馆是资深综合出版社，曾与北京故宫合作出版过《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1995 ～ 2008 年），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出版发展空间。

七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与出版学关系密切。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学，虽然迟至 20 世纪初期才出现，但图书馆学的三个基本子学科：目录学、分类学、提要学，其雏形却是自古就存在的，而且首先也是在宫廷

1 翁连溪：《清宫内务府刻书处——武英殿》，《紫禁城》1992 年第 2 期，6 ～ 9 页；《清宫武英殿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 年第 4 期，54 ～ 60 页；《清代宫廷刻书》，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存在的。譬如应属商朝皇宫藏书的殷墟甲骨，其入藏、排列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如果没有目录学的基本知识，恐怕是不太容易办到的。孔子整理“六经”，多作说明，亦为分类学、提要学之滥觞。作为“故宫学”的图书馆学，至少可分历代宫廷藏书、明清宫廷藏书二大研究领域。此外，相关收藏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历代宫廷藏书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重视文化积累的民族。历代宫廷也都非常重视藏书。虽然藏书的聚散，往往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1]，但藏书的精神，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由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基本都是根据宫廷藏书编撰的，大家已经可以据此了解当时宫廷藏书的大致情况[2]。尽管如此，这里还是要以汉唐、宋元宫廷藏书为例，介绍当时宫廷藏书聚散的一些情况。

1. 汉唐宫廷藏书

如前所说，汉唐时期的整个出版业，都还处在印刷史上的抄写时代。这个时代的藏书，特点是聚难散易。加以汉唐都是在大的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宫廷藏书几乎也都是从零开始。所幸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宫廷藏书终于逐渐丰富。可惜后来又经战乱，多年积累毁于一旦。

（1）汉宫廷藏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挟书律”，宫廷是否有藏书，并不清楚。但秦丞相、御史具体代理天下事务，其府是有藏书的。《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沛公（刘邦）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府]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可见萧何所以能当丞相，刘邦所以能灭项羽，均与萧何获得这批律令图书有关。

据《三辅黄图》、《汉宫殿疏》等文献记载，西汉帝国建立，丞相萧何首先就在长安未央宫中修建了天禄、麒麟、石渠等阁，专“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此三阁成为当时宫廷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不久又废除秦“挟书律”，同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到武帝统治后期，如刘歆《七略》所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到成帝时，刘向奉命领校宫廷藏书。据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的成果名为《别录》（《隋志》著录 20 卷），系综合目录、分类、提要三学的图书馆学奠基之作。刘向死后，哀帝使向子歆继承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中《辑略》下有颜师古注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则知名为《七略》（《隋志》著录 7 卷），实仅六类。但因以“七”为数，仍开图书分类七分法之先河。刘歆《七略》统计当时宫廷藏书有 33090 卷，《汉书·艺文志》著录 13269 卷。可见当时宫廷藏书之丰。可惜这些宫廷藏书，经过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两次大的战乱，又都荡然无存了。

---

1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上海书店，1983 年。

2 另参：向斯：《历朝皇宫宝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中国宫廷善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2）唐宫廷藏书

隋与秦不同，是重视藏书的。《隋书•经籍志一》说：“隋开皇三年，祕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文帝后期，西都长安宫廷的藏书多达 3 万余卷。炀帝即位，由于书多，又于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从甲乙丙丁称谓来看，当时图书分类已是四分法占主导了[1]。炀帝还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唐于战乱之后建国，虽然完整地继承了隋的江山，却没有完整地继承隋的藏书。《新唐书•艺文志一》说：“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嘉则殿的书是隋西都长安的书，经过战乱，已经损失了几乎五分之四；王世充的隋旧书是隋东都洛阳的书，则全部毁掉了。因而太宗继位，又开始大规模购藏天下图书。到了玄宗时期，任命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崇文馆学士褚无量共同负责整理图书事宜。当时迁书于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并在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分创集贤书院，用于修书和藏书。由于需要从民间借异本转录，还让“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据说“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说明当时图书分类已由甲乙丙丁四部，改为经史子集四库了。元行冲等据此修成《群书四部录》200 卷，毋煚摘要编为《古今书录》40 卷，凡收书 51852 卷，可见当时藏书之丰。可惜不久即爆发“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此后国势日衰。虽然也曾“以千钱购书一卷”，并派人到江淮括访及其他地方搜采，至文宗时“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但经黄巢起事、昭宗播迁等一系列动乱，又“荡然无遗矣”。

2. 宋元宫廷藏书

如前所说，宋元时期的整个出版业，都已处在印刷史上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时代。这个时代的藏书，特点是聚易散亦易。关于聚易，正如《宋史・艺文志一》针对雕版印刷出现所说：“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不用抄写录副，就可阅读完整古书，条件自然远较古人为优。因而宋元虽然也都是在战乱后立国，但其宫廷藏书的收集远较汉唐为易。至于散亦易，那是因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已亡，遑论其他。宋元宫廷藏书，及其亡也，皆当作如是观。

（1）宋宫廷藏书

五代乱离，典籍流散。《宋史・艺文志一》说：“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祕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其中屡屡提到的“三馆”，指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此三馆与稍后成立的祕阁，均为宫廷藏书之所，也均归崇文院管辖。仁宗时，王尧臣、欧阳修等编《崇文总目》66 卷，凡收书 30669 卷。虽然收书不及汉唐之丰，但聚书也不及汉唐之艰难。

北宋宫廷藏书之所，除三馆、祕阁，还有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等。及北宋为金所灭，此三处藏书

1 按：图书分类的四分法，为西晋荀勖《新簿》根据曹魏郑默《中经》始创。东晋元帝时，李充编定《四部书目》基本承袭。此后经南朝至隋，图书分类一直以四分法为主流。

尽归于金。如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五述“书籍之厄”时说：“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祕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金史·元好问传》说：“金源氏（金之别称）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金的典章法度，能与汉唐相比，全是因为获得北宋宫廷藏书的缘故。由此可见宫廷藏书作用之大。

而南宋建国，宫廷藏书又得从零开始。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所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一》中说：“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复置补写所，令祕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孝宗时，陈骙编成《中兴馆阁书目》70卷，凡收书44486卷。宁宗时，张攀等又编成《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又收书14943卷。宫廷藏书卷数已远远超过北宋。可见聚书之易。只可惜这些宫廷藏书，随着南宋灭亡，又尽归元朝所有[1]。

（2）元宫廷藏书

元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攻克杭州，将杭州宫廷藏书，包括礼器、谱牒、图册、版籍等，席卷一空。如同《元史·世祖纪六》载同年二月诏所说：“祕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不仅如此，元姚燧《牧庵集·读史管见序》还说：“宋社既墟，诏令湖南宪使卢挚以内翰籍江南诸郡在官四库精善书，板舟致京师，付兴文署。”在此之前，蒙古灭金，也曾尽取《金实录》并祕府图书。这就是说，元宫廷藏书兼有宋、金二朝宫廷之蓄。尽管如此，据《嘉庆松江府志·庄肃传》记载，后来元修辽、金、宋三史，仍感文献不足，还曾命危素向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的庄肃购书五百卷。

《元史》没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故宫廷图书如何收藏，情况不是太清楚。仅知文宗之后，宫廷图书主要藏于奎章阁所属艺文监的艺林库。“奎章”本指帝王的诗文书法等。如《元史·百官志四》奎章阁学士院条：“掌奎章图书、宝玩，及凡常御之物。”但据同书《谢端传》：“初，文宗建奎章阁，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虞集传》：“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吕思诚传》：“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知奎章阁原为修国史的处所，藏书于此，也主要是为了修国史使用方便。

（二）明清宫廷藏书

明清宫廷重视藏书，与历代宫廷一样；惟宫廷藏书的聚散，与历代宫廷不尽相同。关于明清宫廷藏书的记载，可以说非常丰富[2]。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1. 明宫廷藏书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文化与图书，前面谈出版学时已经涉及。明朱国桢《皇明大政纪》卷一说，至元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初平陈友谅，即下诏访求遗书。这种诏访遗书，后来还曾进行过多次，但都不是明宫廷藏书的主要来源。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说，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入北京，首先封元库

1 方建新、高深：《宋代宫廷藏书考》，《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52～60页；方建新、王晴：《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07～115页。

2 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齐秀梅、杨玉良：《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府图籍宝物。这批元宫廷藏书，才是明宫廷藏书的大宗。因为如前所说，元宫廷藏书兼有宋、金二朝宫廷之蓄。而明宫廷藏书则从此兼有宋、金、元三朝宫廷之蓄。这批元宫廷藏书不久都运往南京，藏于文渊阁。但据《明史·艺文志一》记载：“永乐四年（1406 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仍然不够用。后迁都北京，又将文渊阁藏书部分运回北京。英宗正统六年（1441 年）六月诏编《文渊阁书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载杨士奇上言：“文渊阁见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中南京取来，向于左顺门外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點勘，编置字号，辑成《文渊阁书目》，请用‘广运之宝’钤识，仍藏于文渊阁，永远备照，庶无遗失。”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著录，凡收图书 43200 余册。此时距明建国不过数十年，宫廷藏书已然甚丰。可惜到了明末，甲申之变，毁于一炬。

（二）清宫廷藏书

满清入关，没有前明那么幸运，经过甲申之变，不仅宫廷本身要从废墟上重建，宫廷藏书也要从零开始重新收集。但清宫廷的聚书，采取的办法与此前任何朝代都不相同，是借修书聚书。清代官修图书，各朝起居注、实录、圣训、国史等不算，始顺治，终光绪，大大小小，共有 700 余种之多。其中借修书聚书，始于顺治修《明史》。如《清史稿·艺文志一》说：“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借修书聚书，规模最大者，莫过于乾隆修《四库全书》[1]。《四库全书》之编修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当年就曾下诏收集民间藏书。《清史稿·艺文志一》说：“（乾隆）三十九年，催缴直省藏书，四方竞进秘籍甚众，江、浙督抚采进者达四五千种，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家藏之籍，呈进者各六七百种，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亦各进书百种以上。至是天府之藏，卓越前代，特命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著录六千七百八十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可见清宫廷是将借修书聚集的书，都作为“天府之藏”，因而所谓《四库全书总目》，实际也是清宫廷的藏书总目。当然，清宫廷的藏书并不止此。当时，文渊阁专藏《四库全书》，武英殿专藏殿本书，昭仁殿“天禄琳琅”专收善本特藏，养心殿《宛委别藏》专收《四库全书》未收之书。还有其他零散藏书之所。可见说清宫廷藏书“卓越前代”并非虚语。

（三）相关收藏单位

北京故宫虽然没有支撑图书馆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但有收藏清宫旧藏图书及近现代图书的图书馆。此外，还有收藏清宫旧藏图书及档案的台北故宫图书文献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些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都为宣传故宫和推动“故宫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关于清宫旧藏图书及档案的情况，前面谈文献学时已有简单介绍，可以参阅，不再重复。这里仅对此三馆的历史与现状稍作概述。

---

1 当然，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聚书，还为了查禁销毁违碍之书。这些禁毁违碍书籍多达 3100 余种，数量与《四库全书》几乎相等。参阅：洪清泉编：《清代禁毁书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 年；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9 年。

1. 北京故宫图书馆

北京故宫图书馆成立于 1925 年 10 月，是北京故宫成立后最早设置的单位之一，当时的馆长是国学大师陈垣先生。图书馆下分设图书部和文献部：图书部专管清宫旧藏图书，是现在北京故宫图书馆的前身；文献部专管清宫旧藏档案，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后来几经变迁。1949 年以后，不断购藏图书和接受私人捐赠图书，现有各类藏书 50 余万册。由于收藏善本古籍数量众多，2008 年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 台北故宫图书文献馆

台北故宫图书文献馆成立于 1968 年 7 月，原名图书文献处，下设典藏（善本）、文献（档案）、满蒙藏文三个单位，稍后又增设图书馆，成为四个单位，对所藏图书文献分别进行管理。该馆除收藏清宫旧藏图书及档案外，还致力于新旧图书的购藏，以及接受新旧图书的捐赠。2009 年 3 月，就曾接受香港中山图书馆赠送图书 8000 余册，其中包括张元济主编的《四部丛刊》等。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为北京故宫图书馆下属文献部。1929 年 3 月，文献部从图书馆分离出来，改称文献馆。此后名称几经变更。1951 年 5 月，文献馆又改称档案馆。此后隶属几经变更。直至 1980 年 4 月，将北京故宫明清档案部的 800 余万件档案再次划归国家档案局，才正式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馆馆藏明清两代档案多达 1000 余万件，其中除明代档案 3000 余件外，主要为清代档案。绝大部分为汉文纸质档案，也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等。这些档案绝大部分均已经过不同程度的整理编目，能够提供查阅利用。该馆编辑的《历史档案》杂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北京故宫既有大量的图书馆学资源，也不乏专业的图书馆学人才。譬如朱家溍先生，属于专业图书馆学大家。朱家溍先生素有大杂家之称，所著《故宫退食录》，涉及学问甚多，包括书画、碑帖、漆器、木器、饮食、古砚、戏曲、珐琅器、古建筑、明清历史、明清室内装修陈设等等，无不精湛[1]。但他最有素养的，还是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在内的图书馆学。早年曾将家藏善本古籍 2 万余册编为《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8 卷，已颇见目录学、版本学功力。1989 年 1 月就任北京故宫图书馆馆长之后，为北京故宫图书馆的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故宫古籍善本 2600 种、10 万余册，就是由朱家溍先生主持鉴定和编选的。此后，他还撰著、主编了诸如《故宫藏善本书目》、《两朝御阅丛书》、《故宫藏珍本图书丛刊》等一系列图书，并为北京故宫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人才。因此，北京故宫虽然目前还没有支撑图书馆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但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八　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和交叉性都极强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学，虽然一般都追溯到张謇于 1903 年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归来所拟《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议帝室

1　朱家溍：《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 年；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博览馆议》，但其雏形实际早在先秦就已存在了。《周礼·春官·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天府所藏虽然主要都是钟鼎等传国重器，但已具备了博物馆的性质。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国立博物馆，博物馆的两大基本功能：文物收藏、文物展览，可以说很早就已具备。作为“故宫学”的博物馆学，至少可分文物收藏、文物展览、故宫博物院本身三大研究领域。此外，相关管理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文物收藏

文物收藏是现代博物馆的第一大基本功能。该功能的起源，其实与古代天府收藏礼器、法器，皇帝收藏书画、器物，颇有关系。只不过古代天府收藏礼器、法器，属于国家正当工作；而皇帝收藏书画、器物，会被视为玩物丧志。

1. 历代宫廷文物收藏

历代宫廷都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先秦天府收藏礼器、法器已如前述。这里再对汉晋、隋唐、宋元宫廷文物收藏情况稍作简介。

（1）汉晋宫廷文物收藏

前面提到的西汉“孔壁书”、西晋“汲冢书”，后来也都被藏于祕府。《汉书·刘歆传》：“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孔安国献之，……臧于祕府。”《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祕府。”当时的“祕府”，一般指收藏文献之所。收藏器物则一般在“武库”。这里的“武库”，并非专指收藏兵器之库，而是泛指收藏器物之库。《汉书·高帝纪下》：“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武库”紧靠宫殿，应该不是专门收藏兵器之库。《晋书·五行志上》记惠帝元康五年（295年）闰月武库失火：“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可见西晋武库收藏器物之丰富。

（2）隋唐宫廷文物收藏

《隋书·经籍志一》记炀帝即位，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这批书画后来辗转为唐所获，可惜“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唐代朝野均好收藏书画。《新唐书·张嘉贞附孙弘靖传》：“家聚书画，侔祕府。”同书《王缙传》：“家聚书多，不减祕府，图画皆异本。”都与宫廷祕府相比，则知唐宫廷祕府收藏不少。这自然应与皇帝本人喜好有关。唐太宗喜欢王羲之书法人所共知。《旧唐书·刘洎传》：“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同书《褚遂良传》：“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故唐宫廷收藏王羲之书法不少，包括著名的《兰亭集序》。此外，唐宫廷收藏礼器、法器亦复不少。《新唐书·牛僧孺传》记僧孺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文宗特“赐彝樽、龙勺”，并诏曰：“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

（3）宋元宫廷文物收藏

宋陈彭年《江南别录》记南唐“元宗（李璟）、后主（李煜）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这批书画后来为宋所获。《宋史·职官志二》诸修撰直阁条：“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

堂建祕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宋代的“祕阁”就是前代的“祕府”。到了宋徽宗时期，宫廷收藏书画、器物达到鼎盛，曾编《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以炫其目，其中不少书画后来成为清宫藏品[1]。元灭南宋，据《元史•世祖纪六》记载，也曾“收宋国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据同书《百官志四》奎章阁学士院条：“掌奎章图书宝玩，及凡常御之物。”这些书画、器物后来都藏于元文宗所建奎章阁中。元文宗自幼在江南生长，喜欢并擅长书画。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说：“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书画为事。”经奎章阁鉴藏的书画名迹，如晋王献之《鸭头丸帖》，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芙蓉锦鸡图》，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等，至今仍存[2]。

2. 明清宫廷文物收藏

明清宫廷文物收藏，特别是清宫廷文物收藏，与今两岸故宫文物收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已为人所熟知。因而这里也只是稍作简介。

（1）明宫廷文物收藏

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说：“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籍宝物。”则知元奎章阁收藏的书画、器物尽为明所获。《明史•张士诚传》记弟士信及女夫潘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及张士诚被朱元璋平定，这些古法书名画也应尽为明所获。还有，同书《奸臣•严嵩附子世蕃传》说世蕃“好古尊彝、奇器、书画”，据说《清明上河图》也在他手中，及事败，也均被籍没入宫。这些书画、器物，均藏于内府司礼监。同书《职官志三》宦官条记司礼监下有“书籍名画等库掌司”。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说：“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于本衙门居住，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手卷、笔墨砚、绫纱、绢布、纸札，各有库储之。选监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锁钥。”可能就是收藏这些书画、器物的具体场所。今北京故宫藏《清明上河图》，上有万历六年（1578 年）太监冯保题跋，原文为：“余侍御之暇，尝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观其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车之妙，市桥村郭，迥出神品，俨真景之在目也，不觉心思爽然，虽隋珠和璧，不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宜珍藏之。”自署官职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干事司礼监太监。”说明《清明上河图》自严世蕃家籍没入宫后，就一直藏在司礼监所属名画库，冯保作为司礼监太监才有机会从容欣赏把玩。

（2）清宫廷文物收藏

清宫廷文物收藏最为宏富。郑欣淼先生《天府永藏》认为清宫廷文物来源，除承袭前朝宫廷旧藏外，主要有三：一是进呈，二是征求，三是抄没。由于种类太多，数量太大，分藏于宫廷很多地方。《清史稿•职官志五》内务府宦官条记御书房“收贮书画”，养心殿“收掌……古玩书画”，古董房“专司收贮古玩器皿”。还有宁寿宫和南书房。清宫编著的《宁寿鉴古》和“西清三编”（《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乙编），分别为宁寿宫和南书房收藏的古代铜器图录。清宫编著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三编，才应为御书房和养心殿收藏的古代书画目录。此外，圆明园也藏有极为丰富的图书字画和器物珍宝。可惜的是，这些书中著

1 梁江：《宋元宫廷秘藏书画撮要》，《美术观察》2003 年 第 12 期，84 ～ 86 页。

2 李琰：《元代宫廷书画鉴藏概说》，《美术观察》2001 年第 5 期，64 ～ 67 页。

录和圆明园收藏的清宫文物，不少都已亡佚；幸而保存下来的，不少也都已流散。两岸故宫收藏的文物，不过是清宫旧藏文物中的一部分而已。

3. 两岸故宫文物收藏

两岸故宫的文物收藏，前面谈文物学、文献学时已作介绍，可以参阅，这里不再重复。郑欣淼先生《天府永藏》认为两岸故宫收藏文物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清宫旧藏，二是国家调拨，三是私人捐献，四是自己收购。书中同时作了详细介绍，可以参阅，这里也不再重复。

（二）文物展览

文物展览是现代博物馆的第二大基本功能。该功能的起源，虽与古代宫廷文物收藏没有太大关系，但古代宫廷收藏的文物也并非完全秘不示人。《宋史·礼志十七》嘉礼五幸祕书省条记宋高宗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临幸新落成的祕书省，兴致很高，“遂陈累朝御书、御制、晋唐书画、三代古器，次宣皇太子、宰臣以下观讫”。此后，“淳熙五年（1178 年）九月十三日，孝宗幸祕书省，如绍兴十四年之仪”。但对于宫廷来说，既没有展览的责任，也没有展览的义务；即使展览，面对的也是小众，而非大众。宫廷的文物收藏完全是为了皇帝个人的欣赏把玩，与现代博物馆将文物展览作为重要社会功能十分不同。

1. 院内文物展览

院内文物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就已开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根据与清室签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后寝”可以仍由逊帝溥仪占据，“前朝”收归中华民国政府。1914 年在“前朝”的武英殿成立古物陈列所，主要收藏和展出宫廷文物，包括从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运来的 20 余万件文物。1925 年 10 月 10 日成立故宫博物院，又新辟文献陈列室，展品包括不久前（1925 年 7 月 31 日）在溥仪出宫前居住的养心殿卧室内发现的清宫遗老金梁、康有为等人与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 8 份文件，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此后，院内文物展览成为故宫主要工作之一。而随着抗战文物南迁和故宫分属两岸，两岸故宫各自都很重视院内文物展览。北京故宫文物展览分原状陈列（前三殿、后三宫、西六宫、养心殿等）、专馆陈列（青铜、陶瓷、工艺、书画、珍宝、钟表等）、临时特展等多种形式，受到观众欢迎。此外，院内文物展览还包括引进国内各兄弟博物馆和国外博物馆的文物展览。还值得一提的是，郑欣淼先生《关于故宫与故宫博物院》说：“我院争取于院庆之际，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以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2009 至 2010 年两岸故宫在台北故宫成功合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种凡由两岸故宫合办的文物展览，也应属于院内文物展览。

2. 国内文物展览

国内文物展览指北京故宫应国内各兄弟博物馆的邀请，在国内各兄弟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文物展览。近年来，北京故宫国内文物展览很多，最令人瞩目的是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三次文物展览。第一次是 2002 年，为庆祝上海博物馆五十周年馆庆，北京故宫与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合作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72 件书画国宝一起面世，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二次是 2005 年，为祝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合作举办“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103 件晋唐宋元书画稀珍同时展出，又一次引起轰动。第三次是 2009 年，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合作举办“南

陈北崔——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陈洪绶、崔子忠书画特展”，80 件南陈北崔书画作品同时推出，令观众大饱眼福。还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为庆祝香港回归 10 周年，北京故宫与香港康文署在香港艺文馆合作举办“‘国之重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32 件书画国宝一起莅临香江，引起一阵观摩热潮。这也属于北京故宫国内文物展览。

3. 国外文物展览

国外文物展览指故宫博物院应国外各博物馆的邀请，在国外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文物展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就很重视国外文物展览。第一次是 1935 年，故宫文物西行参加了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第二次是 1940 年，故宫文物北上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中国艺术展览会”。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故宫国外文物展览十分频繁，赴展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前苏联、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台北故宫也有国外文物展览，赴展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南朝鲜及中美洲等。

（三）故宫博物院研究

对于“故宫学”而言，博物馆学不是一门泛泛的学问或学科，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必须联系故宫博物院本身进行研究，才有存在的价值。因而这里所谓故宫博物院研究，实际上是指故宫博物院本身的研究。故宫博物院本身的研究，应包括博物馆学理论研究、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人物研究等几个方面。

1. 故宫博物馆学研究

故宫博物馆学研究，一般包括理论博物馆学研究、历史博物馆学研究、社会博物馆学研究、普通博物馆学研究、专门博物馆学研究、博物馆收藏学研究、博物馆技术学研究、博物馆展览学研究、博物馆管理学研究，等等。其中，博物馆管理学研究，对于北京故宫尤其重要。北京故宫的中层管理单位，从开始的几个，到现在的几十个，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博物馆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2. 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

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主要包括故宫博物院成立史研究、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史研究，等等。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33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初，为了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至遭到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决定将贵重文物装箱南迁，从是年 2 月至 5 月，先后检选出文物、图书、档案 13491 箱，分五批经上海运抵南京，并在南京建立文物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历尽艰险，分三路辗转徙往四川，分藏于巴县、乐山、峨嵋山等地。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三处南迁文物又在重庆集中，于 1947 年运回南京。这批南迁文物现在仍然分藏三处：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挑选出 2972 箱文物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1949 年以后，北京故宫陆续运回近 1 万箱，现藏北京故宫；还有 2211 箱，至今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这次故宫文物南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虽然道路艰难险阻，经历曲折坎坷，但文物基本无损，档案基本不缺，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这段历史，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1]。

1 刘北汜：《故宫沧桑》，南粤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

3. 故宫博物院人物研究

故宫博物院人物研究，主要包括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研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学者研究，等等。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经历过多任院长、副院长，培养了众多专家、学者，他们的领导经验和治学经验，都是故宫博物院的宝贵财富，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和研究。譬如马衡先生，既是领导，又是学者，他的领导经验和治学经验，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郑欣淼先生较早写过《厥功甚伟，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 50 周年》的长文[1]。近年还出版过《马衡传》[2]。还有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台湾东吴大学孙亮球的硕士论文《马衡金石学之研究》（2007 年）。又譬如沈兼士先生，也既是领导，又是学者，他的领导经验和治学经验，早已融为一体，受到学术界的关注[3]。

（四）相关管理单位

北京故宫与博物馆学相关管理机构很多，其中，与文物收藏有关者主要有宫廷部、古书画部、古器物部等，与文物展览有关者主要有展览部、宫廷部（该部另有原状陈列组）、宣传教育部等，与博物馆科研工作有关者主要有科研处（研究室）等。其中，随着“故宫学”的发展，科研处（研究室）的工作日益显得重要。科研处（研究室）下属三个科：(1) 综合科：主要为老专家服务，同时也是院学术委员会的具体挂靠单位。(2) 课题项目管理科：主管院科研课题、项目的申报、评审。(3) 院刊学刊编辑部：主管《故宫博物院院刊》（双月刊）、《故宫学刊》（年刊）的编辑。此外，科研处（研究室）还负责组织院内每月一期的学术沙龙，每季度一期的学术讲座，以及走出故宫的“永远的故宫”系列讲座。

九　古建筑学

古建筑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学科。说它是自然科学，是因为它涉及到建筑材料学；说它是社会科学，是因为它涉及到建筑历史学。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古建筑学，虽然迟至 20 世纪 20 年代才由梁思成先生从美国引进，但其理论与实践，实际早在先秦就已存在了。这就是《周礼·考工记·匠人》中关于“匠人营国”的记载，特别是其中关于王宫建筑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先生从美国引进古建筑学之前，他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的博士论文题目，就名为“中国宫室史”。作为“故宫学”的古建筑学，至少可分古建筑文献学史、古建筑营造学史、古建筑维修和保护理论三大研究领域。此外，支撑古建筑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古建筑文献学史

从事任何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研究，首先必须了解其文献，这既是研究的理论，也是研究的基础，古建筑

1 郑欣淼：《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 50 周年》，《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2 期，5 ～ 22 页。

2 俞建伟、沈松平：《马衡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朱兰兰：《沈兼士与明清档案》，《档案管理》2007 年第 6 期，8 ～ 9 页；赵彦昌、唐莹：《沈兼士与明清档案》，《兰台世界》2008 年第 19 期，59 ～ 60 页。

学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古建筑的文献学史源远流长，最早还是得从《周礼·考工记·匠人》说起。

1.《周礼·考工记·匠人》

我们知道,《周礼》虽然成书于汉代,反映的却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而其中“冬官”《司空篇》原缺,后人以《考工记》补。据研究,《考工记》则是一部春秋晚期的齐国官书。该书主要记载器物制作、城邑建设、房屋建筑的制度和规范，相当后世的“法式”和“则例”。其中《匠人》关于王城、宫城、庙社、市里、道路的建设制度和建筑规范,尤其受到关注。譬如《匠人》开头即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据郑玄解释:“营谓丈尺其大小。”可知当时规定国都建设，九里见方，一边三门，共十二门。《匠人》接着说:“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郑玄注：“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可知当时规定都城内部道路建设，东西南北各有九条道路贯通，每条道路能够容纳九辆马车并排通行。《匠人》又接着说：“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郑玄注：“王宫所居也。祖，宗庙。面犹乡也。王宫当中经之涂也。”可知当时规定王宫要位于都城中间大道上，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前面是前朝，后面是后寝。这与明清北京城和紫禁城的建制何其相似！实际上，何止明清，秦汉以降各朝都城和宫城，其建制基本都是如此。《匠人》下文还有关于明堂、祖庙、宫室、门窗、阶级等具体建造尺度的记载，大致亦为秦汉以降各朝所承袭[1]。

2. 从《木经》到《营造法式》

北宋时期,我国木石建筑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其代表性著作,前有《木经》,后有《营造法式》,二者关系密切。

(1)《木经》

《木经》3卷，北宋初年都料匠喻皓撰，大约公元965年至公元995年间成书。其书已经亡佚，仅沈括《梦溪笔谈》有一些介绍。该书首次将建筑物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今建筑物分上架、下架、台基应即渊源于此。其中谈到阶级，特别说“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可见与宫廷建筑亦颇有关系。当然，《木经》的价值并不止此。它不仅被当今古建筑学界称为古人营造房屋从此有了“设计意识”，还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大木结构房屋建筑的“设计规范”[2]。

(2)《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34卷，北宋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奉敕撰。该书熙宁（1068～1077年）年间初编，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该书虽以喻皓《木经》为基础,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说，成就远在喻皓《木经》之上。它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内容包括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大木建筑使用的营造方法，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

1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2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类介绍全文如下：“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级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原注：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绦，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后曰后绦，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倡；后一人，曰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作、瓦作、泥作、砖作、窑作、彩画作等 13 个工种的制度，还含有各工种的用料定额及施工图样[1]。刘敦桢先生对该书的价值和特点进行过概括和总结，认为应该包括五个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以“材”为标准的“模数制”建筑法则[2]。

3.《工程做法》、《清式营造则例》与《清代匠作则例》

《清史稿·职官志五》内务府条记雍正二年（1724 年）“设养心殿造办处”，专“掌制造器用”和“专司带领外匠制造物件”。此后，官修了一系列相关“做法”、“程序”、“册式”、“则例”等。仅同书《艺文志二》史部政书类就记有：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等撰并刊行《工程做法》74 卷，乾隆十三年奏刊《乘舆仪仗做法》2 卷，乾隆三十三年陈宏谋等奉敕撰《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乾隆三十八年金简等奉敕撰《武英殿聚珍板程序》1 卷，还有《城垣做法册式》1 卷、《内廷工程做法》8 卷以及卷帙不详的《简明做法》、《圆明园工部则例》等。此外，没有见诸记载的同类文献和档案还有很多。这里简单介绍几种。

（1）《工程做法》

《工程做法》74 卷，前面已经提到，清管工部事、果亲王允礼等撰，雍正十二年（1734 年）刊行。本书原名《工程做法则例》，内容包括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等十七个专业的做法以及各作的用料、用工等，还附有二十七种典型建筑的设计实例和每种建筑物的剖面图样。当时作为加强对官工的管理和控制官工预算、作法、工料的依据。但对于中国建筑史学界来说，却是一部可以与前述《营造法式》并重的“文法课本”[3]。

（2）《清式营造则例》

《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整理编著。本书由《清式营造则例》、《清式营造辞解》、《各件权衡尺寸表》、《清式营造则例图版》及《营造算例》五部分组成。主要对清代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斗拱形制、大木构架、台基、墙壁、屋顶、装修、彩画等做法及其构件的名称、功用等进行了介绍。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总结出小式和无斗拱的大式建筑以“檐柱径”为模数、有斗拱的大式建筑以“斗口”为模数的模数制营造法则[4]。

（3）《清代匠作则例》

《清代匠作则例》，王世襄先生主编。本书全 10 卷，目前仅出版 6 卷[5]。我们知道，清代有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和档案不少，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等单位均有收藏，目前粗略统计有 150 余种。王世襄先生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拟定了一个整理《清代匠作则例》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得以实施[6]。本书内容广泛，包括土木工程、园林建设、城墙工程、河道工程、军器制造以及漆作、佛作、金银作等工艺的做法和则例，均为抄本，全部影印出版。第 1 卷为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第 2 卷为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可见与“故宫学”关系之密切。这些清代匠作规范标准，对于了解清代匠作的技术、工艺，进行古建筑的维修、保护，有着极

1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 年；陈明达：《〈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 年；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再版本，1984 年。

3 梁思成：《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营造学社，193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 1 ～ 6 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 2009 年。

6 王世襄：《谈清代的匠作则例》，《文物》1963 年第 7 期，19 ～ 25 页；《〈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序言》、《〈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编纂计划》，《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339 ～ 345、369 ～ 373 页。

为珍贵的价值。

此外，近年来，北京故宫对所藏清代则例和养心殿造办处史料，也在陆续整理出版。则例约有 20 余种，大致已全部整理出版[1]。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计划分 5 辑整理出版，目前仅整理出版第 1 辑[2]。相信这些有关古建筑的文献和档案的整理出版，对于古建筑文献学史的研究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古建筑营造学史

从事任何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研究，其次必须了解其历史，就古建筑来说，就是其营造学史。以往编著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3]，近年编著的 5 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4]，实际都是古建筑的营造学史。而古建筑的营造学史，实际都是以都城、宫城为中心展开的。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1. 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新石器、夏、商、西周，属于古建筑由穴巢向宫室发展演变的阶段。《礼记·礼运》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易经·系辞》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与事实大致符合。

新石器时代是以定居为基础的时代，也是我国古建筑初生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南北古建筑呈现不同形式。北方地区，包括黄河流域，由于干燥，流行穴居、半穴居及早期地面建筑；南方地区，包括长江流域，由于潮湿，流行地面建筑及栅居、巢居、干栏式建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古建筑的水平和规模也在发展。如果说属于新石器早期裴里岗文化系统的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发掘出的少量房基仅限于居民住房，那么属于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系统的西安半坡类型发掘出的大量房基就有可能不仅限于居民住房了。

关于夏文化标志性遗址虽然还有争论，但河南郾城郝家台发现距今 4000 年前相当于夏代的古城遗址，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有的还铺有木地板，已经说明夏代的古建筑已较新石器时代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大型都城、宫城遗址，说明当时都城、宫城的营造已有缜密的规划，与夏代又不可同日而语。西周的建筑较商代更为发达，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建筑以版筑法为主，并开始用瓦盖屋顶。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西周早期四合院式建筑遗址，与现在的四合院并无二致。陕西西安发现的西周丰镐都城、宫城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还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2. 成型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属于宫室建筑由不成型向成型发展演变的阶段，

---

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 年。按：本书所收则例，包括《钦定吏部则例》、《钦定吏部处分则例》、《钦定户部则例》、《钦定户部鼓铸则例》、《钦定礼部则例二种》、《钦定工部则例三种》、《光禄寺则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宗人府则例》、《钦定王公处分则例》、《浙海钞关徽收税银则例》等。其中工部、内务府则例，应与匠作有关。

2 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 1 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

4 此 5 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分卷如次：（1）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1 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2）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2 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3）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3 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4）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4 卷《元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5）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5 卷《清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其中外来的寺塔建筑、石窟建筑尤其引人注意。

春秋时期是宫室建筑由不成型向成型迈出的第一步。陕西凤翔发现的春秋秦都雍城的都城、宫城遗址，证实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不是虚语，与春秋晚期出现的《周礼·考工记·匠人》正相印证。战国时期宫室建筑更向高大豪华发展，《史记·苏秦列传》说秦“高台榭，美宫室”，《楚辞·招魂》说楚“高堂邃宇”，“层台累榭”，可见当时宫室建筑的水平。

秦汉时期是我国宫室建筑营造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所谓“秦砖汉瓦”时代。秦的咸阳宫、阿房宫，虽不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述，但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也已极尽恢宏壮丽。而西汉的长乐宫、未央宫，东汉的南宫、北宫，参考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记载，则于恢宏壮丽外，更增典雅妩媚。这一时期，为魏晋以后古建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时期是第一个高峰的延续。西晋左思《三都赋》写尽了魏、蜀、吴三都宫室建筑的艺术之美。南北朝时期寺塔建筑、石窟建筑广泛出现，在为古建筑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吹响了成熟阶段的序曲。因为到此为止，我国古建筑体系已经定型。在类型上，城市的规划，宫殿的格局，建筑的形制，寺窟的样式，等等，都已齐备。在构造上，穿斗架、叠梁式构架和高台建筑、重楼建筑、干栏式建筑等相继确立了自身体系，并成为后来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体构造形式。

3. 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属于宫室建筑达到顶峰的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不同，有较多的古建筑遗存，还有较多的涉及宫室建筑的绘画作品，并有了总结性著述，给学术界保留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

隋唐时期的宫室建筑总的来说气势雄伟，粗放简洁。隋的大兴城，唐的长安城，都是当时世界最宏大的都城建筑。唐太宗李世民《帝京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可见一斑。后来增建的大明宫，特别是其中的含元殿，气势磅礴，高峻雄伟，更加展现了大唐盛世的时代风貌。这一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宗教建筑，如玄奘塔、大雁塔、小雁塔、香积寺塔等，可见当时寺塔建筑的成熟形制。

宋辽金时期的宫室建筑总的来说精巧华丽，纤缛繁复。其中，北宋时期，《木经》代表的木作营造技术[1]，《营造法式》反映的铺作层的形成，组合梁柱的运用，材分模数制的确立[2]，都已更加成熟。北宋汴京的大内宫殿，系仿洛阳宫殿制度兴建，在沿袭汉唐气象之余，增加了唐宋的成熟风采。一幅《清明上河图》，反映了汴河两岸市井、街道、店铺、民居的建筑形制。南宋时期的宫室建筑，带有江南的清润和细腻。山西繁峙岩山寺壁画描绘的金中都宫殿，河北蓟县独乐寺现存辽代建筑，可见辽金时期宫室寺庙的建筑概貌。

4. 程式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元、明、清，属于宫室建筑进一步标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宫室建筑，虽然技术仍很成熟，但体系却凝固甚至僵化。它标志着我国古建筑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面临着向现代建筑的转变。

1 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科学出版社再版本，2003 年。

2 肖旻：《唐宋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元明清的宫室建筑遗存十分丰富，最重要的有元大都遗址，明清北京城、紫禁城和一些大型的皇家园林。虽然土作、瓦作和石作的传统营造方法和法式仍有一些发展和变化[1]，但由于总体规划的发达，使个体设计缺乏创新。

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述略》一文中曾经指出：

> 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明清皇家建筑是一个整体，宫室、园囿、祭坛、寺观、行宫、陵寝、藏书楼及王府等，是一个有统一规划、统一规制、统一管理的庞大的体系。从建筑布局来说，整个北京城都是以紫禁城为中心规划设计的，它西与西苑三海，北与景山、大高玄殿等，东与皇史宬等紧密相连。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整个皇城，西郊的三山五园、散布京城的皇家寺院道观以及各地的行宫等，更与紫禁城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如承德外八庙就因为都属皇宫内务府直接建造、管理又地处京城之外而得名[2]。……

明清以紫禁城为主体的皇家建筑，在总体规划上无疑是成功的，但在个体设计上有多少属于创新，恐怕就很难说了。特别是清代官修相关“做法”、“程序”、“册式”、“则例”等，更加促使个体设计者只须照章办事，不须开动脑筋。这种宫室建筑体系，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应该是众所周知的。

（三）古建筑维修和保护理论

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理论，虽然主要发源于欧洲，但对我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理论的形成，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

1.“整体修复”原则及其论争

关于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方法。1844 年，法国人 V.L. 杜克为 1163 年始建、1345 年建成的巴黎圣母院进行修复设计，首次提出“整体修复”古建筑的原则。他认为：一座建筑及其局部的修复，应保持原有的风格，不仅在外表形式上，在结构上也必须如此。在修复之前，一定要确切地查明每个部分的年代和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修复的逐项实施计划。他关于一定要确切地查明每个部分的年代和特点的观点，属于建筑考古，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他过分强调了恢复原状和风格统一，似乎是用“创作”代替了“修复”，给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而就在同时，英国人 J. 拉斯金虽然不是直接针对 V.L. 杜克，但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建筑的“修复”。他认为：“修复”不仅意味着破坏，而且是最彻底的破坏，对古建筑只能加强经常性的保护。英国人 W. 莫里斯与 P. 韦伯等人于 1877 年创立“古建筑保护协会”，支持 J. 拉斯金的观点，继续强调古建筑不可能修复，修复后的古建筑实际成为了“假古董”。他们认为：只能用保护代替修复。为保护可以采取加固措施，但绝对不能因此改变古建筑本身和装饰的原貌。这两种理论：前一种属于过于有所作为，后一种属于完全无所作为，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都是不利的。

---

1 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年。

2 茹竞华：《紫禁城的总体规划——兼谈古代宫殿建筑的继承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3 期，24 ～ 34 页。

2.《雅典宪章》与《威尼斯宪章》

1880 年，意大利人 C. 波依多在反对 V.L. 杜克和 J. 拉斯金的基础上，对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 世纪初期，同为意大利人的 G. 乔瓦诺尼又补充和发展了 C. 波依多的观点。以波依多、乔瓦诺尼为代表的理论主要是：古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活的见证，要保护建筑物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它所在的原有环境，对历史上的一切改动或增添的部分都要保护。1933 年，由国际联盟倡议成立的“智力合作所”在雅典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以乔瓦诺尼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雅典宪章》。1964 年 5 月 31 日在意大利威尼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保护古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威尼斯宪章》，这正是《雅典宪章》的继承和发展。它进一步明确了古建筑的概念，即它不仅包含建筑物本身，并且包含着与之相关的环境，因而要求“不得整个地或局部地搬迁古建筑”，并且强调应该利用一切科学和技术来保护和修复古建筑，使它能传之永久。但无论是《雅典宪章》，还是《威尼斯宪章》，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都以欧洲的石质古建筑为中心，对于东方的木质古建筑来说，相关的真实性界定和干预政策等都是不适用的。

3. 北京故宫百年大修与《北京文件》

2007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三大文化遗产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共同举办，近 20 个国家的 60 余位专家参加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直接起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0 届会议关于北京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的决议。该决议质疑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等 3 处世界文化遗产地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保护维修工程，是否过于仓促，是否缺少足够的根据，是否有清晰、系统的保护指导准则。该决议请缔约国明确说明相关准则（即缔约国是否遵循了国际公认的共同准则），并请缔约国组织一次地区性研讨会，研讨亚洲地区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以及国际普适的保护准则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等重大课题。此次会议因此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地区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地（故宫、天坛、颐和园）保护状况的评论和建议》，对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会议最终形成的《北京文件》，被国际同行称作是一份“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参考价值”的文件。《北京文件》对文物的保护原则、文化多样性与保护、文献档案、真实性、完整性、保存与修整、木结构油饰彩画处理、重建、管理、展示、培训等概念重新作了严格的界定，并明确指出：“在修复中要充分认识到遗产的特殊性，并保证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不改变遗产的历史、有形与无形等特征。”对于我国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四）支撑组织及单位

北京故宫一向重视古建筑，不仅设有与古建筑学相关管理机构，还设有支撑古建筑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前者包括古建部和古建修缮中心，后者包括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和中国紫禁城学会。这里主要介绍后者。

1. 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

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挂靠北京故宫古建部。中心成立之前，北京故宫就一直

非常重视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并拥有一批专业古建筑学大家，如单士元、王璞子、于倬云等先生。单士元先生早年曾治明清史、档案学，成绩卓著。稍后受聘于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学研究，以与王璧文先生共同编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成名[1]。此后一直在明清古建筑学领域耕耘，成果甚多，贡献极大。著有多卷本《单士元集》[2]。王璞子先生早年也曾在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学研究，对清工部《工程做法》研究尤深[3]。在故宫工作期间，以元大都古建筑研究为中心，上溯辽金，下及明清，颇有建树[4]。于倬云先生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典型科班出身，长于主持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的维修与保护，成果显著[5]。中心成立之后，以开展学术研究、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为工作重点。研究范围包括北京故宫古建筑、明清皇家建筑以及中国宫殿建筑发展、中外宫殿建筑比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等。

2. 中国紫禁城学会

中国紫禁城学会成立于 1995 年，业务主管是国家文物局，挂靠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学术团体。目前有 16 个团体会员单位，会员 200 余人。学会内另设宫廷建筑历史、艺术、技术、保护与利用、古建筑材料研究五个专业委员会。学会宗旨是：联络国内外中国古建筑及历史、文物、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研究力量，对北京故宫宫殿建筑及相关的坛庙、园林、陵寝、行宫、官署、府第等明清宫廷建筑文物、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紫禁城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研究，逐步建立“紫禁城学”。并提出：“紫禁城学”是“故宫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故宫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学会除举办学术研讨会外，还编辑出版会刊，组编“紫禁城文化丛书”，举办“紫禁城文化”系列讲座。1997 年创办《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至今已编辑出版了五辑[6]。

一〇　文保科学

文保科学既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保科学，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存在，但正式跨进大学殿堂，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这是因为，文保科学的确十分复杂，不仅横跨文、理、工甚至医等多门学科，还划分地下文物保护、地上文物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等等。这种复杂的文保科学，只能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而诞生，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古代就没有文物保护，只不过保护的手段与现代完全不同。譬如古籍保护，平常的防火、防水、防尘、防潮一般能做到，防虫就很难做到。古代关于蠹鱼蚀书的诗歌甚多。如白居易《开元九诗书卷》：“红笺白纸两三束，半是君诗半是书。经年不展缘身病，今日开看生蠹鱼。”为了保护古籍，古人常常采取刻石的办法。譬如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

1 单士元、王璧文编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国营造学社初版，1937 年。

2 单士元：《单士元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陆续出版。

3 王璞子主编：《清工部〈工程做法〉注释补图》（全 4 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管理部油印本，1980 年。

4 王璞子：《梓业集——王璞子建筑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5 于倬云：《中国宫殿建筑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紫禁城宫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主编）《故宫经典：故宫建筑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6 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 1 ～ 5 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 ～ 2007 年。

还有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以及房山石经等等。为了保护文物，古人也常常采取刻石的办法。譬如北宋游师雄将唐昭陵六骏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均摹绘刻石。作为“故宫学”的文保科学，门类很多，包括古籍保护、古建筑保护、古钟表保护、古书画保护、古陶瓷保护、青铜器保护、竹木漆器保护、铁质文物保护，等等。现代虽然都可以采取高科技保护[1]，但高科技也并非万能，还是得从传统保护着手。这里限于篇幅，仅就古籍、古书画、青铜器的传统保护谈谈看法。

（一）古籍保护

如前所说，古代宫廷都喜欢收藏古籍。但古籍的载体，甲骨、金石、简牍姑且不论，较早为绢，稍后为纸，都是极易磨损老化之物。在印刷史上的抄写时代，多采取装裱保护；在印刷史上的照像制版时代，可以采取影印保护。

1. 装裱保护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有一节名为“论装背褾轴”（“背”同“褙”，“褾”同“裱”），开头即说：“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据此可知，装裱之法，晋代以前即有[2]，只不过技术不行；直到南朝刘宋的范晔，进行装裱，技术才过了关。该节接称：“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图书，装背为妙。”可知装裱之法，最初主要用于书籍和图籍。自此之后，便出现“卷轴”一词，作为图书之代称。如：《南齐书·陆澄传》：“（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君）见卷轴未必多仆。’”《梁书·张充传》：“充幸以鱼钓之闲，镰采之暇，时复以卷轴自娱，逍遥前史。”《陈书·儒林·沈不害传》：“不害治经术，善属文，虽博综坟典，而家无卷轴。”到了隋唐，图书裱轴渐趋华丽。《隋书·经籍志一》：“炀帝即位，祕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紺瑠璃轴，下品漆轴。”《旧唐书·经籍志下》：“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据《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有“熟纸装潢匠九人”；史馆“掌修国史”，有“装潢直一人”。同书《职官三》记载：崇文馆“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有“装潢匠五人”。余嘉锡先生指出：“唐……有装潢匠。所谓装者，必兼装背言之，不仅接缝褾轴也。”[3]因为“潢”专指纸张上潢，所以“装”就成为了装背、装裱的省称。《旧唐书·职官志二》记集贤殿书院有“装书直十四人”，此处的“装”也是指装背、装裱。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说：“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图书的装裱保护，是汉唐时期之事。宋代之后，随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普及，图书装帧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图书的装裱保护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影印保护

影印指照像制版。照像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照像技术传入中国之前，中

1 马清林等主编：《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科学出版社，2009 年；大卫·斯考特著、马清林等译：《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科学出版社，2009 年。

2 按：《隋书·牛弘传》：“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同书《经籍志一》记载略同。其中“赤轴青纸”应指经过装裱的图籍。宋武帝刘裕入关灭姚秦，在东晋义熙十三年（417 年），可见装裱之法，确实晋代以前即有。

3 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装背》，《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 年，515 页。

国已有所谓“影刻”。清著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年）《思适斋集》卷一二《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针对宋元善本严重散佚的情况，说：“举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他主持校刻的诸多古书，大都根据宋元善本精摹覆刻，也就是所谓“影刻”。照像技术传入中国后，最早使用的推测应该就是清朝宫廷。北京故宫藏有不少清宫照片，包括慈禧太后本人的照片，都是那个时候拍的。什么时候用于影印古籍，一时难以考证，可以不用管他。前面曾经提到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从中国购买过不少清廷文件的影印本，但时间不会太早。民国年间最有名的影印古籍，莫过于《四部丛刊》。《四部丛刊》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主持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涵芬楼影印的一部大型古籍丛书。该丛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版本，专选宋元刻本和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手稿本，分为初编、续编、三编，每编都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504种、3134册、近1亿汉字，于1919年首次用宣纸影印出版，其版本价值之高，远远超过《四库全书》。新中国成立后，最有名的影印古籍，莫过于《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再造善本》最初定性为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工程，是很有道理的。据有关介绍，该工程始于2001年。是年，财政部和文化部联手对大陆现存善本古籍的存藏情况进行调研，发现中国的版印书籍已经大量散佚，不仅唐五代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宋元刻本也万不一存。2002年5月，经过反复论证，认为：仅存的善本多在公藏机构作为文物进行保护和收藏，既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传承的万无一失，也不利于文献的传播和利用。因而财政部、文化部决定联合发文，成立中华再造善本规划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该工程拟分唐宋、金元、明代、清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五编，第一期已选750种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古籍善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期望能以现代化手段将存世的古籍善本进行精确复制，既利于古籍善本的保护，又利于古籍善本的安全传承和充分利用。虽然《四部丛刊》在当年、《中华再造善本》在现在，都曾遭到“假古董”的嘲讽，但这种观点是缺乏代表性的。这就像现存晋唐古书画大多都是后人摹本一样（前已提到，另见下文），有谁能说这些摹本都是“假古董”没有价值呢？

（二）古书画保护

如前所说，古代宫廷都喜欢收藏古书画。但古书画的载体，砖、石、陶、瓷、壁、木等等姑且不论，大致是纸、绢并用，也难免磨损老化。传统的保护之法有二：一是装裱，一是临摹。

1. 装裱保护

前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背褾轴”接下来谈装裱方法、最佳季节、选置工料设备和装裱前对古画的清理[1]。关于装裱方法、最佳季节、选置工料设备，该节说：“凡煮糊，必去筋，稀缓得所，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研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原注：赵国公李吉甫家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也）。候阴阳之气以调适，秋为上时，春为中时，夏为下时。暑湿之时，不可用。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纸缝先避人面及要节处，若缝缝相当，则强急，卷舒有损，要令参差其缝，则气力均平。太硬则强急，太薄则失力。”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装裱方法，虽是针对古书画，对古籍也是适用的。关于对古画的清理，

1 宿白：《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文物出版社，2008年，29页。

该节说：“古画必有积年尘埃，须用皂荚清水数宿渍之，平案扦去其尘垢，画复鲜明，色亦不落。”可知所谓装裱，实际亦将修复工作包含在内。该节最后说：“或者云：书画以褾轴贾害，不宜尽饰。余曰：装之珍华，裹以藻绣，缄縢蕴藉，方为宜称。必若大盗至焉，亦何计宝？惜梁朝大聚图书，自古为盛，湘东之败，烟焰涨天，此其运也。况乎私室宝持，子孙不肖，大则胠箧以遗势家，小则举轴以易朝馔，此又时也，亦可嗟乎？”张彦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主张古书画裱轴应该华丽，实际的意思应该认为这也是对古书画的一种保护。北宋宫廷所藏书画则都要装裱。北宋徽宗时官修《宣和画谱》序称：“中秘所藏魏晋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画以轴计，自然都是装裱过的。南宋高宗御撰《翰墨志》说：“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祕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联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说的也是北宋徽宗时事。当时书画的装裱，也是极尽华丽。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记南宋高宗时内府所藏书画装裱的分等情况甚详，大致是：“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据《宋史·职官志四》祕书省条记载：两宋古书画均藏于祕书省的祕阁，祕书省置“装裁匠”若干人。“装裁”之“装”，与前面谈到的唐代“装潢”、“装书”之“装”，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均指装背和装裱。这种职业装裱技艺，在两宋已有“宣和装”、“绍兴装”之目，经过元朝的地域化，到了明清逐渐分门别派。元世祖曾三次掠徙江南民匠约 40 万户，置于燕京等地，为“京裱”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明末清初淮海人周嘉胄著《装潢志》，系统论述装潢要领，促进了苏、扬两地装裱业的发展，为清代“吴裱”中的“苏裱”、“扬裱”的衍生和定型起了很大作用。清沈初（1729 ～ 1799 年）著《西清笔记》，记乾隆时清宫装裱常请“苏裱”完成。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专设“裱作”，汇集南北装裱高手，从事清宫收藏书画的修复与装裱。还专设“匣作”。“裱作”负责装裱，“匣作”负责装匣，合称“匣裱作”。汉传书画只须“裱作”就可以了，藏传唐卡则还需要“匣作”[1]。这种专门技艺，北京故宫仍然保存。2008 年，北京故宫保存的“古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已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临摹保护

古人早就知道，临摹也是一种保护。相传东晋顾恺之不仅善于绘画，也善于临摹，并曾著《论画》介绍“模写要法”[2]。南朝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论绘画“六法”，第六法即为“传移模写”，并称刘宋刘绍祖“善于传写”。据两《唐书·职官志二》集贤殿书院条记载，当时曾置书直、画直、搨书、拓书一类小吏负责抄写临摹工作。《旧唐书·薛收附从孙稷传》说：“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薛稷成为临摹古书画高手，也与当时重视古书画临摹有关。两宋时期，宫廷专门聘请书画名家从事临摹，以

1 另参：傅东光：《乾隆内府书画装潢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2 期，111 ～ 140 页；罗文华：《清宫唐卡绘画与装裱的机构及流程》，《中国藏学》2005 年第 4 期，78 ～ 82 页。

2 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顾恺之云：“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据研究，顾恺之《论画》似未涉及模写，《魏晋名臣画赞》却谈了模写之法。美术史界遂有题目互误之争论。参阅：袁有根：《关于顾恺之〈论画〉与〈魏晋胜流画赞〉题目互误及其他》，原载《新美术》1998 年第 3 期，收入《顾恺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年，249 ～ 260 页。

保存古书画。其最著名者，北宋为米芾（1051 ～ 1107 年），南宋为赵世元（1131 ～ 1162 年）。前引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记南宋宫廷按等级装裱书画，临摹作品也在装裱之列，如“钩摹六朝真迹”、“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等，还有“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可见临摹作品的待遇也是不低的。到了明清，临摹之风更盛，可惜后来多非正道，所谓“湖南造”、“河南造”、“广东造”、“苏州片”以及“北京后门造”和“扬州皮匠刀”，都成了造“假古董”的渊薮。但宫廷毕竟不同。《清史稿•艺术传一》序称：“（康熙）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同书《艺术传三•唐岱传》说：“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于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高宗万几之暇，尝幸馆中，每亲指授，时以为荣。其画之精美者，一体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凡载八十余人，其尤卓著可传者十余人。”清如意馆的画工，实际工作多属临摹。按：临摹属于保护工作之一种，今人也是清楚的。20 世纪 40 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宗旨之一就是临摹敦煌壁画，保存敦煌壁画。饶宗颐先生的书画，喜欢抚意借笔，曾云：“余谓‘四王’作画，每题曰：‘师倪、黄某卷。’抚其格局，而笔笔皆自己出，何尝是倪、黄耶？”[1] 其说源自《庄子•齐物论》[2]，实际认为抚意借笔亦系创作。据此，临摹亦当属于创作之一种。我们知道，现存晋唐古书画大多都是后人摹本。譬如现存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如果没有这些摹本，那些晋唐古书画是什么模样，后人恐怕早就无从知晓了。前称临摹也是一种保护，意义正在于此。当然，临摹是一种专门技艺，并非任何人都能掌握。北京故宫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引进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一批掌握古书画临摹技艺的专家，包括冯仲莲、金仲鱼、陈临斋等先生，专门从事古书画的临摹。冯仲莲先生临摹的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金仲鱼先生临摹的宋徽宗《听琴图》、郭熙《窠石平远图》、崔白《寒雀图》，陈临斋先生临摹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胡环《卓歇图》、元王渊《花竹锦鸡图》，都是能够乱真的精品，其中很多摹本均被作为文物收藏，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2010 年，北京故宫保存的“古书画人工临摹复制技术”，已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青铜器保护

如前所说，古代宫廷都喜欢收藏青铜器。但青铜器出土时难免受到损坏，放置久了也难免产生锈斑和受到腐蚀。传统的保护之法有二：一是修复，一是复制。需要说明的是，修复和复制虽然属于两个概念，但作为青铜器保护，二者却很难截然分开，因而放在一起进行解说。

关于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的起源，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如《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按：此事《吕氏春秋•审已》、《新

1 饶宗颐：《睎周集后记》，原载《睎周集》，线装本，1971 年，收入《选堂序跋集》，中华书局，2006 年，39 页。

2 王素：《选堂书画与齐物思想——从“参万岁而一成纯”引起的思考》，“庆贺饶宗颐先生 95 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敦煌：敦煌研究院，2010 年 8 月 9 日～ 10 日。

序·节士》等书亦载，但“谗鼎”作“岑鼎”，人物与事情也有出入。这些可以不用理会。对于此事，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据此可以认定中国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一种意见认为这条记载不够准确，中国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实际产生于宋代，发展到明代才开始成为一种专门的工艺技术[1]。在此，我同意前一种意见。因为据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记载，唐天宝年间至南唐后主时，朝廷一直在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仿铸前代青铜器。北京故宫就藏有一件唐代仿制西周青铜觯。到了宋代，仿制前代青铜器已经相当普及。宋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收宫廷所藏商代至唐代青铜器 839 件，其中不少都是当时的仿制品。北京故宫也藏有一件宋代仿制商代兕觥。此后经元至明，特别是明万历、天启年间，修复和复制青铜器形成派别，其中以金陵（一作苏州）的甘文堂最具代表。甘文堂善铸铜炉，仿铸宣德铜炉，成色和分量与真品一丝不差。到了清末，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更趋成熟，出现了北京、潍县、开封、苏州、西安等五大流派。其中北京派主要指“古铜张”。而“古铜张”的创始人张泰恩的技艺出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太监“歪嘴于”。据说“歪嘴于”于光绪年间出宫，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庙内开办“万龙台”古铜器修复作坊，收张泰恩为徒，为后来的“古铜张”的创派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原来就有修复和复制青铜器的机构。台北故宫藏有一件清乾隆年间仿商周青铜酒杯觯的形制制成的掐丝珐琅兽面纹觯，应该就是该机构的作品。北京故宫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引进了一批掌握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的专家，其中就包括“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赵振茂先生。这些专家先后修复了商代司母辛鼎、商代二祀邲其卣、商代齐史□作祖辛觯、西周班簋、春秋立鹤方壶、东汉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青铜器，复制了商代兽面纹觚、商代兽面纹瓿、西周牛尊、西周荣簋、西周杜伯鬲、西周鸟祖辛卣等一系列重要青铜器。2010 年，北京故宫保存的“中国青铜器传统修复和复制技术”，已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余　论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故宫学”之下分设的十个子学科，每个子学科也都是有着丰富内涵和宽广外延的。但仅此也只是给“故宫学”支起一个简单粗略的框架。这里要强调的是，支起这个框架，主要是想明确相关领域。因为从事学科建设，明确各自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历史学”下分“历代宫廷史”、“明清宫廷史”二大研究领域，实际上就是要明确这两个领域。所以要明确这两个领域，是为了突出明清和历代的不一样；如果不需要突出明清，合为“古代宫廷史”一个领域就可以了。“宫廷史”下分“宫廷政治史”和“宫廷典制史”二小研究领域，也是为了明确这两个领域。因为宫廷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制定的一切制度，都可以分别属于这两个领域。然则，是否可以另分“宫廷考古史”、“宫廷宗教史”、“宫廷文化史”、“宫廷财政史”呢？我以为，作为学问是可以另分的，作为学科则不可以另分。因为，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宫廷考古史”应该属于“考古学”，“宫廷宗教史”应该属于“宗教学”，“宫廷文化史”应该根据内容属于“文物学”、“文献学”或“出版学”、“博物馆学”，“宫廷财政史”应该属于“历史学”下分的“宫廷史”再下分的“宫廷典制史”。不然就全乱套了。这也是学科建设与学问研究的区别。

1　莫鹏：《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源流刍议》，《中国博物馆》1998 年第 3 期，82 ～ 87 页。

此外，还有一些子学科，由于考虑尚不成熟，没有列入。譬如：

1. 民族学

如前所说，两岸故宫都藏有大量少数民族文物、文献和档案。此外，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割据北方甚至入主中原，堪称史不绝书。十六国、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基本都被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占领。隋之杨氏，唐之李氏，也都有少数民族血统。五代后唐、后晋、后汉，辽、金、西夏，也都是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元和清更是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加上沿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象"安史之乱"一样的少数民族暴乱政权，那就更多了。不仅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颁行，大都由高踞宫廷的皇帝决定。因此，在"故宫学"之下分设民族学子学科，是不应有什么问题的。

2. 医药学

医药学原出宫廷。炎帝（神农）尝百草人所熟知。黄帝（轩辕）有太医岐伯，专"主方药"。秦汉以降，宫廷均置太医官署，名医及珍稀医药著作，也多在宫廷。《汉书·艺文志》说成帝时求遗书于天下，得到后让专家分校，其中"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据颜师古注："侍医"即"侍天子之医"，也就是后来的御医；"方技"在这里专指"医药之书"，包括后世的医方、药方。唐宫廷设尚药局，重视药方的收集与整理。两宋宫廷另设御药院，国子监刻书，经、史之外，以医药书为最多，与御药院颇有关系。宋、金均有《御药院方》，可惜失传。元许国祯等据金《御药院方》另编元《御药院方》，于至元四年（1267 年）刻板流行[1]。明宫廷医学十分兴盛。据最新研究，明宫廷医学与包括常熟医学在内的苏州医学关系极为密切[2]。清宫廷医学也十分兴盛。北京故宫藏有不少清宫医书和医学文物[3]，其中还有用满文翻译的《西洋药书》[4]。台北故宫也藏有很多清宫手抄医方及医案，其中不少为日本抄本，如蓝川慎《读肘后方》、真濑玄朔《换骨抄》、丹波元简《医方契领》，还有日本抄本宋杨倓《杨氏家藏方》等[5]。清宫旧藏医案的整理也一直颇受关注，且有成果问世[6]。因此，在"故宫学"之下分设医药学子学科，也是不应有什么问题的。

3. 摄影学

现代"写真"一词，指人物摄影。此词自古即有，主要指画人物真容。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唐王维《崔兴宗写真咏》："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白居易《自题写真》："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有时也指画景物真貌。如唐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闻君写真图，岛屿备萦回。石黛刷幽草，曾青泽古苔。"据此可知，现代"写真"的含义，实本于古之"写真"。前引《颜氏家训》所说"武烈太子"，指梁元帝太子萧方等。据此又可知，古之"写真"，与宫廷颇有关系。按《后汉书·马援传》："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同书《马武传》："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

1 周益新：《〈御药院方〉研究》，《山西中医》2007 年第 1 期，55 ～ 57 页。

2 任昉：《明代常熟医学与宫廷医学——以明常熟医学训科李原墓志为线索》，"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故宫博物院，2009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

3 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4 李欢：《清宫旧藏满文〈西洋药书〉》，《紫禁城》1999 年第 4 期，30 页。

5 陈仁寿：《台北故宫珍藏中医手抄孤本丛书》，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待出。

6 季钟朴：《清宫医案的整理》，《紫禁城》1981 年 5 期，17 页；陈可冀：《清宫医案集成》，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于南宫云台。”这就是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条：“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这就是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新唐书·艺文志三》还著录有《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古代在宫廷图写功臣真容的例子甚多，这里无须多说。这都属于“写真”。前面曾经提到，照像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最早使用的推测应该就是清朝宫廷[1]。此外，北京故宫有名为资料信息中心的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摄影、录像，收集、制作了大量与故宫有关的影像资料，整理、出版了大量与故宫有关的影像图书，对“故宫学”贡献甚大。因此，在“故宫学”之下分设摄影学子学科，是有充分根据的。

4. 旅游学

近年来，随着世界旅游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旅游业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学也越来越受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也是如此，北京更是如此。就北京故宫而言，虽然古代宫廷从来就不是劳动人民能够旅游之处，旅游学与古代宫廷没有任何关系，但与现代北京故宫的关系却是十分重大。北京故宫 30 个中层机构，在职人员中，开放管理处人数最众。北京故宫每年接待游客超过千万，并且仍在持续增长。北京故宫作为世界最大的遗址博物馆，游客来此并不仅仅是参观展品，更重要的是参观遗址。现代旅游学的各个分支，譬如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学、旅游组织学、旅游生态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环境学等等，都与北京故宫的旅游业关系密切[2]。前面曾经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作为“故宫学”，不仅应该追溯历代，也应该兼顾现代。因此，在“故宫学”之下分设旅游学子学科，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里介绍的这四个子学科，如前所说，由于考虑尚不成熟，就只能更加简单粗略了。当然，也是在抛砖引玉。总之，“故宫学”博大精深，“故宫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大的细化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杨丽丽）

1 刘北汜、徐启宪主编：《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2 王洪滨主编：《旅游学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年；傅云新、蔡晓梅主编：《旅游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年；杨强主编：《旅游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臧良运：《旅游学概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年。